

·新 论·

我国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再认识

李玲玲, 武毅英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历史上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筛选装置”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历社会逐步向能力社会过渡,学历与文凭的独特作用已日渐式微,高等教育在促进阶层向上流动方面的充要条件也变得不那么充分。虽然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功能已有所减弱,但是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依然不可或缺,我国高等教育依旧是实现阶层分化和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分层;人力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5-0011-06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LI Ling-ling, WU Yi-y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used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 "screening device" fo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histor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diploma-oriented society has been making a gradual transition to an ability-oriented society. In this context,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omot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has been weakened. On the one hand, higher education as a mechanism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plays a less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man resources is still indispensable. In today'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is still an important way to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upward mobility, but it is not the only wa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和声望(社会标准)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三大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把阶层对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占有情况作为划分标准,将整个社会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并将它们分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五种社会经济等级^[1]。这种分层方式的核心思想是人力资源配置高低有序,

能够在总体上保证“高能者”居社会上层,能力低者居社会底层。此类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比较符合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现状。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个体参与高等教育选拔,实现不同高校类型和层次的分流,从而通向不同待遇和地位的社会职位得以体现的。以此视角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在当代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颇具时代性和適切性。

一、人力资源配置是高等教育的固有功能

高等教育与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方式有所不同。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的学科、专业、学历、质量对其就业流动和未来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起一种类似社会分层的作用。而市场配置人力资源,主要是雇主和受聘者双向选择的结果,人力资源在市场机制或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分别流向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进而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个体在高等教育类型、层次、学科和专业方面的差异,可以使人力资本的质量有所不同,或使其知识技能高低不一,进而使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或在社会阶层中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因此,高等教育使得社会成员能够有机会根据自身特长、兴趣和能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岗位,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地位层次甚至自动跨越地位层次。所以,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不仅能够在纵向上优化社会结构,也能在横向上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人力资源配置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相吻合,增添社会活力。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的良性发挥也反过来能够对社会分层起到优化配置的促进作用。

(一)高等教育推动人力资源的社会流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工作的变更取决于个体特征,教育是个体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就业能力、适应能力和灵活性也相应提高,从而减少失业人数、降低失业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设,贝克尔(Becker)认为“学校教育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倾向于更多地投资在职培训,这是他们职业较为稳定和收入比其他工人增加得更快的原因”^[2]。正是由于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个人更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培训投资,当他们流动到另一个厂商时会继续这样做,因此他们期望在一家厂商中停留比其他工人更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将更彻底地搜寻,从而通过流动取得更大的工资收益^[3]。有学者采用美国国家青年追踪调查数据对教育程度、工作流动和收入三者关系加以研究,发现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而言,由工资差异引起的自愿性流动中的获益是正的;对受过大学教育者而言,之前的收入对其自愿性流动的可能性有正的影响;流动者的教育收益率高于非流动者^[4]。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对劳动者工作流动产生影响的同时发挥了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二)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

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看作一种提高个人技能的投资,认为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收入水平就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收入水平也越低^[5]。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 M. Blau)曾对美国的职业分层和学历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教育学历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73^[6]。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enks)和他的同事们在《谁将领先》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青年人的最终地位和工资收益最明显可见的预兆就是他的受教育年限”^[7]。可见,高等教育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阶层分布。尽管不同职业对学历的要求在不断变化,但具有较高地位的职业对学历的要求较高,且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在竞争高地位职业中也有较大优势。在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8]。

(三)高等教育促进人力资源的代际流动

人力资源代际流动通过职业代际流动和收入代际流动得以体现。高等教育使受教育者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职业和收入两方面取得比父辈更优越的条件,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阶层流向较高的社会地位阶层,促进社会分层合理化。有研究显示,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能够提高其成为优势社会地位人群的可能性,教育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布有助于增强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子女社会地位的作用,并削弱家庭背景这一先赋性因素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9]。高等教育创设人力资源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假设,符合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是才能而非出身决定整个社会的收入”的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然而,并非所有观点都认为教育具有促进人力资源代际流动的功能,如鲍尔斯和金帝斯(Bowles & Gintis)等人就提出教育无助于促进代际流动。当然,还有一种以卡诺伊和列文(Carnoy & Levin)为代表的折中观点,认为教育一方面在复制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代际流动。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配置功能可通过推动劳动者的社会流动,提高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以及促进受教育者的代际流动得以实现。那么,值得反思的是: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是否相同?尤其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充当何种角色?

二、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之嬗变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个体主要是通过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如今,接受好的教育未必就能获得好的职业或更高的收入,因为其他非教育因素的影响也在同时起作用。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特征。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成为寒门学子的不二选择。中国明朝时期科举登第人员中来源于贫寒家庭的比例达到50%,清朝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37.2%^[10]。这说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流动仍然保留了这种开放型的特点,但不都是向上流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高等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影响,高等教育的选择机制倾向工农子弟,使其实现身份上升流动的同时获得较高职业地位,而“拥有知识”者却可能变成社会“最底层”人员。此时,高等教育成为执政党实现均等化、无阶级差异之理想社会目标的工具^[11]。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改革一方面从大众化模式向精英化模式转变,使得高等教育促进个体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功能逐渐增强,甚至变成“使社会‘贵族化’和分层化的机器”;另一方面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使得高等教育逐渐由“全公费”变成“半自费”、“自费”,且学费数额不菲,经济条件差的家庭难以承担,造成阶层间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也有了新的变化。

其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已日渐式微

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终身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时期。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教育对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以至于有人将高等教育看作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机器,认为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大众化实现下层阶级向中层阶级流动。然而,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同时也意味着高等教育从地位取向转到生存技能取向。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对人力资源的诉求与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据统计,自2009

年至2012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12],接近4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2013年全国更有百万应届生放弃参加高考^[13]。适龄青年减少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但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毕业即失业”等新的“读书无用论”无不影响工农家庭子女上大学的积极性。“大学学霸回家种地”、“研究生回家养猪”等头版头条,使“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曾让无数学子奉为圭臬的信条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质疑和挑战。且不论诸如此类抢眼的新闻是对大学生创业的误读,还是针对大学生就业的担忧,仅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的功能在这些实例面前确实显示出弱化的趋势。

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式微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成为阶层固化的推手,具体表现在高等教育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阶层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扩招使得高等教育机会总量得以明显增大,但这种改善被高校类型和层次等质性的劣势地位所替代。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断扩大的同时进入重点大学的竞争却更加激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曾表示,“尽管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逐年提高,2012年已达到59.1%,但我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仍偏低”^[14]。另一方面,高校不菲的学费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别地区出现“因教致贫”和“因教返贫”的不良现象。特别是在西部农村地区,“有大学生的家庭是村里最穷的家庭”^[15]。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因为子女上大学而使物质生活陷入绝境的现象为“读书致贫论”提供了特定的生长土壤。2009年,甘肃省农业部门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全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16]。这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出现的大问题。教育的这种不公平状况不但无法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层,而且限制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使得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趋于逼仄,可能导致高等教育作为“中产阶级之孵化器”^[17]的功能失效。

其二,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弱化之原因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和知识技能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然而,高等教育优化社会分层和促进合理流动的功能却呈弱化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的弱化。另一方面,从教育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教育为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的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

层的经济资本;除此之外,社会流动还有一种潜规则:获得高收入、高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今天,潜规则的作用已经大于显规则^[18]。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从社会结构上看,精英教育时代,我国弱势阶层极高的比重与高等教育极低的入学率形成鲜明反差。如1950年初,我国近90%的人口居住在全国约80万个村庄中,而当时高校仅有205所,在校生仅为11.7万人,毛入学率仅为6.5%^[19]。就当时而言,个人要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只要大学毕业即可。对广大弱势阶层子女而言,高等教育着实成了“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显现出极大的人力资源配置作用和社会分层功能。然而,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相应地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弱势阶层人数越来越少,中间阶层人数越来越多。1999年农业劳动者占劳动人口的55%以上,近几年已经低于40%。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来的是越来越多工人阶级青年开始进入大学,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13年的30%,个人要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仅靠大学毕业还远远不够。高等教育在促进个体社会流动、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机会的机制作用明显弱化。

从高等教育系统来看,高校大学毕业生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结果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类型又是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和就业质量的关键性因素。现如今,教育规模的扩大必将使人才培养层次上移,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类型提出新的要求,体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就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历层次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人力资源类型要求越来越多样。而事实是:一方面,诸多用人单位不适当地提高招收劳动力的学历要求,造成人才高消费的人力资源配置错位现象;另一方面,许多高校没能准确定位,培养不出“适销对路”的人才,导致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加之大量大学生求职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精英人才心理和预期标准,对就业抱有过高的期望,最终造成难以实现基本就业的现象。因此,与精英教育时代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相比,同等层次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明显下降,社会流动程度受到限制,高等教育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就难以正常发挥,弱化趋势在所难免。

其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削弱了社会分层的功能。学校发挥社会分层作用的机制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社会的上层,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进入社会的中层,而只受初等教育的人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则进入社会的底层^[20]。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尽管高等教育为越来越多的学子敞开大门,看似提供了更多通向上层的机会和可能。但是,在金字塔形的社会阶层中,社会上层的位置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将大部分人挡在中上层的门外,高等教育将学校划分了等级层次,为不同的人准备不同的教育资源。同是高等教育,不同学校间的水平和质量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在不同学校所获得的通往上层阶级的通行证(文凭)的含金量也有云泥之别。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使得大学毕业生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机会相对减少,进入理想社会阶层的难度加大。特别是普通院校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在物价快速攀升的今天,大学毕业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迅速上升。相比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使得无数农村学子期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愿望逐渐化为泡影,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进入社会的上层。

最后,家庭背景在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增强。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就研究了社会关系网络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其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欧美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人们在就业过程中还是会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些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帮助,克服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流动的障碍,从而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21]。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伴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的凸显,加之教育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为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进入体制内就业影响明显,父亲职业是决定大学生“能否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关键,“想进体制内就业需‘拼爹’”。此外,蓝皮书中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也显示:民众普遍认为,人脉关系、权力地位是决定一个人成败的重要因素。坚持认为个人努力是决定成功的主要因素的比例只有7.5%,还不及民众对运气(7.7%)、命运(7.7%)、机遇(12.6%)等不确定因素的期望值高^[22]。

三、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之维系

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教育,考上大学意味着户

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特别是对农村学生而言,考上大学就很容易实现身份地位的上移,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而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大众化教育,上完大学似乎“一切回到起点”,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很难,“收入甚至不及农民工”。因此,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了新的市场。然而,读书真的无用了吗?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路真被堵死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相比精英教育时代,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合理分层方面的功能有所减弱,但是,不论哪个时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是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途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也依然是农村学生实现上升流动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一)教育依旧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长期以来,毕业生失业现象司空见惯。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如今的毕业生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就业困境。但是,如果社会成员不接受高等教育,要想获得高薪,找到满意的工作,其难度不言而喻。在教育文凭和社会分层关系依然密切的今天,学历和文凭的神话自然也难以被打破。科林斯在其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教育和分层的历史社会学》里就揭露了技术精英的神话:“名义上人们追求高学历是为了学习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许多高学历和高职位联系在一起,高学历文凭是获得高职位的敲门砖,因此是为了这块敲门砖而去拿那些高等文凭。”^[23]以当前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为例,教育背景是参与公务员考试基础而重要的准入门槛,“大专及以上文凭”成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正式标准,所有希望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都必须具备大专以上文凭。随着高等教育重心的后移,招考职位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家公务员考试要求硕士以上学历的比例逐年增多,甚至有逐渐替代本科学历主流位置的趋势。由此可见,没有学历资格就没有机会参与公务员职位的竞争和选拔,接受高等教育是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必由之路。因此,当前所处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学历仍是一个人现实身价的重要砝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取向的重要参考;教育依旧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和根本保障,高等教育仍是实现阶层上升的重要途径。

(二)更高的学历层次依然是社会成员不懈的追求

尽管如今的大学文凭对大学毕业生而言更多的只是教育提供给他们的一种劳动力市场准入资格,所起的作用并不像教育理论家曾说的那样重大。但是,

如果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就连最基本的竞争资格都不具备,更不用说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占有。因此,一边是面对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的现实,一边却在争先恐后地争取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近20年来,考研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名人数直到2014年才出现继2008年下降之后的第二次下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热衷于继续升学,很大程度是受制于就业的压力。一般院校的毕业生实现基本就业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实现理想的就业。因此,许多高校毕业生选择通过升学的渠道实现缓解就业压力和提高未来就业竞争力的双重目的。除了能够获取更高层次学历的机会,升学的好处还在于能够给予学生进入更高水平大学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尤其是招聘单位在不了解应聘者真实能力的情况下,“高学历具备高能力,名校出高徒”等思想观念依然难以改变,达到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学历层次是求职者在应聘中脱颖而出重要法宝。不仅如此,追求更高学历层次也是社会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不懈努力的方向。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公务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热潮持续升温,官场高学历成员急剧上升,都无不体现学历在评价体系和上升资格中评价地位的提升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三)国家落实相关政策以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是制约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正常发挥不可忽视的障碍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级差距”,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然而,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的现实依然抢眼。针对这种“寒门难入名校”的现象,国家已在积极采取各项举措改善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状况。在继2012年国家首次在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定向招生计划后,2013年国家扩大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进一步扩大区域、增加高校,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国家在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工作方面的决心。此外,随着国家和地区异地高考政策的逐步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得益于异地高考政策,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和高校招生入学考试均等机会,从而实现社会

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将进一步增加。从这个意义上看,制约高等教育人力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的教育公平问题得以有效缓解,高等教育依旧是农村学生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渠道,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仍然得以维系。

参考文献

- [1]曹锦清,陈保平.中国七问[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231.
- [2]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M].3r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3]JOVANOVIĆ B. Firm-specific capital and turnover[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6):1246-1260.
- [4]李文利.从稀缺走向充足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供给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69.
- [5]周天合.资本新探[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115.
- [6]刘慧珍.教育社会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8.
- [7]何建章.中国社会指标的理论 and 实践[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175.
- [8]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312.
- [9]郭丛斌.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D].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6:154.
- [10]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8):244.
- [11]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412.
- [12]人民网.全国高考人数连续4年下降弃考人数超300万[EB/OL].(2012-09-17). <http://edu.qq.com/a/20120917/000064.htm>.
- [13]陈灏,王橙澄,关桂峰.2013年全国共百万应届生放弃参加高考[N].大连晚报,2013-06-07.
- [14]徐静,贺莉娜,黄晓燕.北大新生农村生源14.2% 名校农村生源呈下降趋势[N].广州日报,2013-10-16.
- [15]张枫霞.当代大学生生存状态调查[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83.
- [16]张光忠,等.中国高等学校资金安全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8.
- [17]陈义平.分化与组合——中国中产阶级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242.
- [18]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40.
- [19]杨德广.先进文化与高等教育创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2.
- [20]高德胜.生活德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6.
- [21]赖德胜,孟大虎.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42.
- [22]李莉,李峥嵘.社会蓝皮书:贫富分化最受关注超半居民不信“大V”[N].北京晚报,2013-12-26.
- [23]《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十字路口的中国基础教育——明日教育论坛总第30辑[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84.

收稿日期:2014-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社会分层案例研究”(项目批准号:BIA110061)

作者简介:李玲玲,1986年生,女,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评估与管理;武毅英,1959年生,女,江苏连云港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研究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经济、大学生就业。